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德]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 著

善恶的彼岸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魏育青 等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尼采注疏集

刘小枫 ● 主编



善恶的彼岸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德]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 著

魏育青 黄一蕾 姚轶励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善恶的彼岸/(德)尼采著;魏育青,黄一蕾,姚轶励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9

(经典与解释·尼采注疏集)

ISBN 978-7-5675-5071-1

I.①善… II.①尼… ②魏… ③黄… ④姚… III.①善恶-哲学理论-研究②哲学理论-德国-近代 IV.①B82②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1955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尼采注疏集

善恶的彼岸

著者 (德)尼采

译者 魏育青 黄一蕾 姚轶励

审读编辑 温玉伟

责任编辑 陈哲泓

封面设计 吴元璞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插页 2

印张 10.25

字数 238千字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5071-1/B·1011

定价 48.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古典教育基金·“资龙”资助项目

“尼采注疏集”出版说明

尼采是我国相当广泛的读书人非常热爱的德语作家,惜乎我们迄今尚未有较为整全的汉译尼采著作集。如何填补我国学园中的这一空白,读书界早已翘首以待。

“全集”通常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含义指著作者写下的所有文字的汇集,包括作者并未打算发表的笔记、文稿和私信等等。从这一含义来看,意大利学者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编订的十五卷本“考订版尼采文集”(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缩写 KSA, 实为十三卷,后两卷为“导论”、各卷校勘注和尼采生平系年),虽享有盛名,却并非“全集”,仅为尼采生前发表的著作和相关未刊笔记,不含书信。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另编订有八卷本“考订版尼采书信集”(Sämtliche Brief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8 Bänden)。

其实,未刊笔记部分,KSA 版也不能称全,因为其中没有包含尼采在修习年代和教学初期的笔记——这段时期的文字(包括青年时期的诗作、授课提纲、笔记、书信),有经数位学者历时数十年编辑而成的五卷本“尼采早期文稿”(Frühe Schriften: Werke und Brief 1854—1869; Joachim Mette 编卷一、二; Karl Schlechta / Mette 编卷三、四; Carl Koch / Schlechta 编卷五)。

若把这些编本加在一起(除去 KSA 版中的两卷文献,共计二十六卷之多)全数翻译过来,我们是否就有了“尼采全集”呢?

Giorgio Colli 和 Mazzino Montinari 起初就立志要编辑真正的“尼采全集”,可惜未能全工,Volker Gerhardt、Norbert Miller、Wolfgang Müller-Lauter 和 Karl Pestalozzi 四位学者在柏林—布兰登堡学园(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支持下接续主持编修(参与者为数不少),90 年代中期成就四十四卷本“考订版尼采全集”(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44 Bände,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67—1995, 共九大部分,附带相关历史文献)。我国学界倘若谁有能力和财力全数翻译,肯定会是莫大的贡献(最好还加上 *Supplementa Nietzscheana*, 迄今已出版七卷)。

“全集”的第二个含义,指著作者发表过和打算发表的全部文字,这类“全集”当称为“著作全集”(KSA 版十五卷编本有一半多篇幅是尼采 1869—1889 的未刊笔记,尼采的著作仅占其中前六卷,未刊笔记显然不能称“著作”)。尼采“著作全集”的编辑始于 19 世纪末。最早的是号称 Großoktavausgabe 的十九卷本(1894 年开始出版,其时病中的尼采还在世),前八卷为尼采自己出版过的著作,九卷以后为遗稿;然后有 Richard Oehler 等编的 Musarion 版二十三卷本(1920—1929)、Alfred Bäumler 编订的 Kröner 版十二卷本(1930 陆续出版,1965 年重印)。这些版本卷帙过多,与当时的排印技术以及编辑的分卷观念相关,均具历史功绩。

1956 年, Karl Schlechta 编订出版了“三卷本尼采著作全集”(Werke in 3 Bänden, 附索引一卷;袖珍开本,纸张薄、轻而柔韧,堪称精当、精美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自己出版的著作精印为前两卷,卷三收尼采早期未刊文稿和讲稿以及“权力意志”遗稿。KSA 版问世后, Karl Schlechta 本因卷帙精当仍印行不衰——迄今已印行十余版(笔者所见最近的新版为 1997 年),引用率仍

然很高。

Karl Schlechta 本最受诟病的是采用了尼采胞妹编订的所谓“权力意志”遗稿(张念东、凌素心译本,北京:商务版 1991)——由于没有编号,这个笔记编本显得杂乱无章(共辑 1067 条),文本的可靠性早已广受质疑。KSA 版编辑尼采笔记以年代为序,从 1869 年秋至 1889 年元月初,长达近二十年(七至十三卷,近五千页),其中大部分不属遗著构想,所谓“权力意志”的部分仅为十二和十三卷(十三卷有贺骥中译本,漓江出版社 2000;选本的中译有:沃尔法特编,《尼采遗稿选》,虞龙发译,上海译文版 2005)。

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并没有留下什么未完成的遗著,“权力意志”(或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写作构想,其实已见于最后的几部著作(《偶像的黄昏》、《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敌基督》)——尼采想要说的已经说完,因此才写了《瞧,这个人》。按照这种看法,尼采的未刊笔记中并没有任何思想是其已刊著作中没有论及的。

研究尼采确乎当以尼采发表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研读尼采或充满激情或深具匠心地写下并发表的文字。此外,尽管尼采的书好看,却实在不容易读(首先当然是不容易译),编译尼采著作,不仅当以尼采的著作为主,重要的是要同时关注注释和解读。

我们这个汉译“尼采注疏集”含三个部分:

1. 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收尼采的全部著作,以 KSA 版为底本(其页码作为编码随文用方括号注出,便于研读者查考),并采用 KSA 版的校勘性注释和波恩大学德语古典文学教授 Peter Pütz 教授的“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共十卷)中的解释性注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采集法译本和英译本的注释——Gilles Deleuze/Maurice de Gandillac 主编的 Gallimard 版法译全集本主要依据 KSA 版;英文的权威本子为“剑桥版尼采著作全集”)。

2. 尼采未刊文稿——选编重要的早期文稿(含讲稿和放弃了

的写作计划的残稿)、晚期遗稿和书信辑要。

3. 阅读尼采——选译精当的文本解读专著或研究性论著/文集。

由此形成一套文本稳妥、篇幅适中、兼顾多面的“尼采笺注集”，虽离真正的“汉译尼采全集”的目标还很遥远，毕竟可为我们研读尼采提供一个较为稳靠的基础。

“尼采注疏集”是我国学界研究尼采的哲学学者和德语文学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各位译者都有很好的翻译经验——这并不意味着译本无懈可击。编译者的心愿是，为尼采著作的汉译提供一种新的尝试。

刘小枫

2006年5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Pütz 版前言

著作的各个阶段

通观尼采的全部著述,不免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它们可以清楚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作品包括《悲剧的诞生》(1872)和《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76)。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忠实追随者。他的文学批评素来言辞激烈,甚至富有攻击性,矛头直指“经院派”,其始作俑者在尼采看来是苏格拉底;他批判 19 世纪的学究派,鞭挞日益匮乏的德意志精神,痛心于其中力量、生命的丰盈以及天才性的丧失。第二阶段从《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开始,经由《朝霞》(1881)直到《快乐的科学》(1882),其中又出现了新的转变。在这中间阶段,尼采与其说是狂热的爱好者,毋宁说是启蒙意义上的怀疑者、心理学者和分析者。他认为,对哲学和科学真理的追求的最高准则是“知识分子的诚实”,它绝不顾及思考者与其所思之物是否会受到伤害。这一阶段的尼采在音乐和人性方面都越来越疏离瓦格纳,学者的地位要高于艺术家,后者颇成问题的生活遭到了尼采这位敏感细腻、意识超前的批评家的质疑。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写

道,艺术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完成从宗教走向一种“真正解放的哲学科学”的过渡。第三阶段发端于《快乐的科学》,从《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直至终结。此时尼采试图克服对真理的狂热。“权力意志”^①与“同一事物的永恒轮回”这两大主题取代了启蒙式的怀疑。从《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那一声“是”以后,尼采开始了价值的转变,开始建立其宏大的形而上学。艺术得以恢复名誉,并以其积极的、独一无二地起着激励作用的生命力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对以上勾勒的尼采思想发展诸阶段细加考量,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界限有失清晰,甚至内部自相矛盾。这些阶段被《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罩上了隐喻的外衣,尼采在此书开头即表示,“我给你们说说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怎样变为骆驼、骆驼怎样变为狮子、狮子怎样变为孩子。”在此,骆驼指代厚重传统的耐心负荷者以及文化精髓的悉心守护者,而后骆驼却驮着这些珍宝进入沙漠,在那儿它变成了凶猛的狮子,横扫历代崇尚的信条和价值,撕裂和破坏是中间阶段唯一的能力。但这种否定的力量毕竟为新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使得第三阶段的孩子能利用或者说应该能利用这些新的可能性。在他身上,扎拉图斯特拉要求并希冀实现一种更高层次、更有收获的天真。“孩子无辜、健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种初始运动、一种神圣的肯定(Ja-sagen)”。

从问世顺序来看,《善恶的彼岸》(1886)紧随《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根据后者的阶段模式,《善恶的彼岸》似乎以第三阶段为指向。然而,该书的副标题尽管以这一阶段为目标或至少希望如此,却已显露出限制和保留——“未来哲学的前奏”,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哲学的时代尚未到来,或许还很遥远,甚至根本不会

^① [译注]或译“走向权力的意志”,下同。

出现。既然尼采自己都把这一期待之物称为“前奏”，那么我们从听到的就是一段节目的序曲，不过这节目暂且还只能是“未来的音乐”。由9个部分组成的整个乐章和以“假如真理是个女人”开篇的序言，让人暗自期待，这里即使没有新真理的诞生，至少会有对新认识的追求。然而，这一文本的内容证明，扎拉图斯特拉所期盼的孩子离降生还早得很，或许还没进娘胎呢。本书的作者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第二阶段，扮演着猛狮的角色，即激进的批判者和否定者。纵然怀有宣告新理念产生的强烈意愿（《权力意志》等），他在本质上依然是革故除旧的破坏者和所有业已成规的真理的怀疑者。甚至对启蒙运动的原则也是如此，尼采虽然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尤其在《朝霞》中明确表示信奉，却在《善恶的彼岸》中抨击和嘲讽了这些原则，如思想的优先权、通过平等、妇女自我解放实现的生活状况人性化等等。但是，诸位要小心这些定论！事实上，正如尼采认为人是“尚无定论的动物”（第三章62节），哲人里几乎也就他这么一个会拒绝“定论”。

与启蒙运动若即若离的关系

此书中不少频繁运用的词汇和概念透露出其思想史根源，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并不愿意彻底背离启蒙运动的道路和目标。第五章的标题为“论道德的自然史”，这里的“道德”绝非单纯与传统习俗、善举恶行（比较本书标题）有关，而且在18世纪的思想背景下，它的内涵更多地涉及到人的全部领域，与非人性的自然世界和物理世界不同的全部领域。“论道德的自然史”不仅涉及伦理的问题，而且包括认识论、心理、政治（民主）——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康德看来可以成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切（康德把三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归入人类学）。除了道德这一概念之外，此书另外几处也与18世

纪的核心思想和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例如:第七章探讨了“吾辈美德”(“美德”是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概念),第二章标题为“自由的精神”(比较“自由精神”),第一章标题为“哲人的偏见”。1689年,经常被人称为“德国启蒙运动之父”的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举行了一次讲座,这对他之后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比如,他在《理性学说》(1691)中多次引用这次名为“关于妨碍我们认识真理的偏见”的讲座。他的思想脉络是如此展开的:人尽管在幼年就已是上帝的造物,并且相对所有无理性生物而言,负有较为崇高的使命,然而人比任何小动物都更需要帮助。那些动物出生后不久就能独立行动,有些种类的动物甚至很快就能离开母亲独立生活,而人作为幼儿却长期需要父母哺育,生活在其羽翼之下。在最初几年,父母主要促使幼儿身体健康成长,但同时也在思想和情感上对之产生影响。他们的帮助演变为主宰。与前后相继的各个历史时期相类似,父母将他们的道德观灌输给孩子,让他获得他们认为合适的书本知识,把他交给他们眼中理想的老师和学校。于是便产生了所谓 *auctoritas* (权威),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能和不愿摆脱这种权威,它正是偏见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主要来源则是“偏见陡生”(*praejudicium praecipitantiæ*),这种偏见是由于操之过急、缺乏耐心、贪图安逸而产生,人们没有对来自经验的必然情况进行周全的考虑,也没有深思其背后不同的原因。从心理角度来看,这两种偏见来自爱的两种与理性相悖的错误形式:急躁和安逸源于人对自己的过分的爱;源于人对轻而易举的乐趣的渴求;权威的力量源于对他人、对其教条和机构的过度之爱,由此偏见成为自主思考的障碍;作为权威,作为不受制约的情绪,偏见掌控一切,为所欲为。

康德近一个世纪之后才提出的启蒙运动纲领(“人走出他咎由自取的未成熟状态”),托马修斯早就超前说出了其核心所在。无须他人引导,自主运用理智,康德对人的这一要求早就蕴含在托

氏对权威乃是偏见的揭露之中。托马修斯也由此在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努力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并预言了康德的思想。这么说是因为托马修斯和康德一样想要净化理智,为可靠的认知寻找正确的方法和指南。19世纪末的尼采也植根于这一传统,即便他——比如在《善恶的彼岸》中——如此抨击和嘲讽康德、黑格尔、笛卡尔和伏尔泰。尽管他的抨击总是义愤填膺,但是他从来是对事不对人,只是针对这些人所持的观点。一如在《朝霞》中那样,尼采在其晚期著作里形式上也依然遵循启蒙主义关于自主认识的要求,但他随即迈出了激进的一步,非但无视启蒙原则的内容,反而对其进行启蒙的批判。因而当他在第一章探讨“哲人的偏见”时(顺便提一下,托马修斯也将其《理性学说》分为几“章”^①),他是在攻击在他看来最顽固不化的偏见之一,迄今为止的哲人全都难逃落入其臼的宿命。尼采认为,不管有多少种问题与答案,不管它们彼此多么对立,不管各种版本的真理多么迥异,哲人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回避了一个问题,即首先如何探究和评价“寻求真理”这一过程本身。如果说,康德对认识可能性的条件进行发问时已经假定这种认识的意义和目的毋庸置疑,那么尼采就要追问企图获得这种认识的目的何在。前者只是探讨真理产生的前提,后者则也在研究真理引发的后果。发生了这种根本性的思维转向,就不会像莱辛那样,还认为寻求真理本身既是一种自在的价值,似乎正因为这种寻求必须不受阻碍地继续下去,这种价值就具备了合理性。正相反,尼采想知道的是,这种认识的渴望如何获得能量以及它会把人引向(诱往)何方。他不把追求真理的意志视为理所当然的公理,而是追问其成立的合理性。

① [译注]指也用了 Hauptstück 一词表示“章”。

化解对立

尼采提出追求真理的合理性问题是依据以下设想：真理的对立面，亦即虚假，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可能远远高于前者，因而最深刻的真理可能基于谬误。人们不能无视以下这种思想：事物要感谢其对立面；因为关于在事物和价值中存在坚不可摧的矛盾关系的观点只不过是形而上学论者的一种信仰。从尼采 1880 年间留下的文字里我们发现了这么一段相关的摘记：“世上本无对立的東西，只是从逻辑的矛盾中我们获得了对立的概念，并将其错误地植入实物中。”另一段为“如果说有什么意味着我们的人性化，意味着一种切切实实的进步，那便是我们不再需要过多的、甚至是任何的对立。”这两句引言都是针对一种尼采视为错误的假设：事物和价值中存在对立关系。两句引言的目标一致，但论证的方向却不同：前一句指出对立的来源是逻辑，也就是出自意识的公式，并认为没有理由将对立视为实在。而第二句并不追问“对立”的缘由（来源），而是它对改善人的此在状况是否有意义。倘若这两段话放在一起，尼采的观点就赫然眼前了：从其原因和后果两方面来看，这种对实物的对立区分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根据“对立”的来源，它确乎只是“头脑里的幻影”，而从它的作用来看，它要么为弱化人的力量而骗取人的对立面，而实际上对立面是对人的存在的补充；要么使人意识到自身矛盾，使其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而毁灭。人要想得到自我解脱，似乎唯有认识到：对立的产生要归咎于语言的笨拙，其实只存在等级和极细腻的层次。

尽管尼采的正题和反题充满分歧和矛盾，但他的全部著作中贯穿着一种仿佛是思维风格的和谐。这种和谐部分来自于：尽管形式不断变化，基本主题却保持着相似性。作者总是以一种轮回式的、最多略有偏离的手法描述相同或相近的现象，却并没有建立

系统的关联,从而导出一种逻辑可证的认识上的进步。无论有多少转变和断层,尼采在后期作品中越来越频繁、越来越详细地引用自己早期的作品,这体现了严格的意志一致性。《瞧这个人》和《道德的谱系》的前言证明尼采努力使他的作品被理解为一个整体。他一再强调其“认识的基本意志”中的“共同根基”和“融为一体”的目标。其中他将互斥对立面的消除与一种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这一进程到时将会或者应该实现自己的目标(“未来哲学”)。这种期望或要求基于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因为事实上他自己的思想仍然徘徊在矛盾与自相冲突中,那种企图消除矛盾的努力与矛盾暂且还保持着的主导地位形成鲜明的对比。关于包容一切对立的整体的思想,尽管是作者梦寐以求的,但这个整体却要抵挡住以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面貌出现的对手的猛烈攻势。事实上的分裂和希望中的统一是尼采哲学思维活动中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的因素。

从他最初的作品开始,尼采就一直致力于克服这个一盘散沙的整体。在他第一批文化批评文章里,如在他死后出版的巴塞尔演讲集《关于我们学校的未来》中,他批评学术活动过于分散,单一学科各自为营,缺乏相互的关联。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他抱怨与德国政治上统一相反的文化现象连续性的缺失,并且针对这种不足提出了要求:“文化首先是一个民族在各种生存境遇下艺术风格的统一。”在《悲剧的诞生》中他反对艺术和自然原则,即和谐静穆的日神精神与桀骜不羁的酒神精神的两分,并用“两性”的比喻证明两者既对立又共生的关系。《快乐的科学》把对寻求真理的认真执着,即那种面对最险恶的悬崖也不怯步的精神,与轻松明快、故作潇洒的肯定生活的态度相结合。《善恶的彼岸》也是旨在化解不可调和的矛盾。

单单这本书的标题就已在向“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宣战,试图寻找超越这种对立关系的新领域,化解势不两立的局面。这里

的“彼岸”不像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那里成为一个更高的第三方(合题),以扬弃并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构成反题的前两者。在尼采这里,对立只是得到容忍,而不是和解。就他个人的想法,冲突的解决更重要。但未来的哲人则要克服这种关于对立和互斥的折磨人的意识。这是本书的中心要义所在。不仅关乎“善”、“恶”的伦理、道德,而且关乎一条普遍的原则:化解对立。正如第一章开头所言,真理是以谬误的形式出现的(反之亦然),尼采也在善中寻找恶,在意识中寻找本能,在进步中寻找倒退,在传统上从属于“精神”的追求真理的意志中寻找服务于“生命”的追求权利的意志。真理一方面要在一个新的审判庭——“生命”——面前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又一直不断地受到生命的渗透和推动。谁要是认识到谬误比逻辑可证的真理更具有维系生命的力量,谁就会抵制横行于世的价值观,从而走向“善恶的彼岸”。因为他知道,即便是最抽象的思想也由本能欲望引领,任何一种哲学都只不过是哲人的表述,而哲人的欲念结构甚至决定哲人的概念、判断和结论,遑论哲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公理。与柏拉图、廊下派哲学和德国唯心主义相反,尼采认为真理并非对恒久本质的认识,而是同样处于变化状态的现象臣服于不断变化的追求真理的意志,即“权力意志”的精神表现。

“生命”和“权力意志”

自从有了“权力意志”这个概念,也许更确切地说这个隐喻,它就愈发频繁地出现在尼采自《快乐的科学》以来的著述中,他1880年间的遗稿的首批主编(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彼得·加斯特)甚至把他那时作的笔记、残稿都以此为书名结集出版——如今水落石出,和尼采本人意图作一对比,人们发现这种做法是故意造假。尤其是因为该词被法西斯分子当作顺口而难得的

口号接受,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所以要运用它就至少必须作出解释,但这一尝试立刻会失败,如果人们只是在政治甚至生物意义上误解了该词的话(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饲养”、“培育”等词上)。

毋庸置疑,“权力意志”这类词语极为危险,很有可能遭到滥用,而且在黑暗时期已经被滥用了。阿尔弗雷德·博伊姆勒在1931年出版的《哲人和政治家尼采》一书中,为纳粹接受尼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以权力意志为观察中心,认为这个口号吹响了第三帝国向敌对西方国家宣战的号角。与之相对,虽然并非旨在打消尼采的危险性,但以下考虑仍有必要,以便尼采文本的意义不被人肆意地断章取义。尼采文本里的矛盾和多义令人恼怒,这种现象部分地源于层次迥然不同的词语之间的切换,源于轮廓清晰的定义和信手拈来的隐喻之间的切换,源于具象的画面和抽象的概念之间的切换。“病态”、“颓废”、“有力”、“健康”从其字面意思来看似乎只是指生理学上的诊断,实际上却是指心理学甚至人类学意义上的常见状态,并通过不断的膨胀和转义获得了较之其最初的医学—生物学内涵要深远和广泛得多的意义维度。于是,病态的不只是个人或群体,而是也涉及某些思维方式,如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也涉及某些信仰方式,如基督教道德里的信仰,也涉及艺术创作方式,如瓦格纳的音乐艺术创作。与之相类似,“权力意志”意义的出发点在于军事扩张上的需求,但同时也主宰着宗教、哲学、艺术的精神王国,这些精神产物反过来也是从追求权力提升的不可阻挡的意志中产生的。

任何对尼采的阐释都会遇到一种特殊的困难。难就难在除了第一层纯粹生理学的意义和第二层隐喻性质的扩展意义之外,还能发现第三层意义。这第三层意义尽管具备转义特征,但其形象化的生物学来源却是不容否认的。这一倾向尤其在尼采的以下努力中得到证实:他不是精神—道德领域,而是从生理领域中探寻思想、信仰、创作的原动力。即是说,第一层纯生理的概念在第三